

探源云南

以活态传承提升云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对云南农业遗产的挖掘整理以及活态传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云南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曲凯音

作为历史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农业文化遗产被称为“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其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于2002年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千年厚重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孕育了我国历史悠久、独特的农业文化。我国也是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和受益者。2013年,我国开始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评选,截至2022年,农业农村部已认定六批共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有18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首位。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是供给人类原材料和食品的重要来源。挖掘整理好云南农业遗产,并做好云南农业遗产的活态传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云南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链升级以及农业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本报记者沈浩摄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特性

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除了具有一般文化遗产的特点,更是融经济、生态、技术、文化以及景观等于一体的“活态”遗产,是更加注重人与自然、人地和谐的复合型活态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主要呈现在它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特性上。从生产功能上看,农业文化遗产的生产系统依然是通过精耕细作、间作、轮作等为人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农产品和服务,保障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安全。例如,入选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每年5月—6月份栽种水稻,10月—11月份水稻收获后,翻耕播种大麦或者小麦,来年5月—6月份收获,麦茬翻耕后再栽水稻。这种水旱轮作,提高了复种指数,为人类提供了多种农作物,是农业资源不断循环生产与利用的典范。

其次,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也体现出它的活态性。农业文化遗产基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地理和地域资源进行再生产、再利用,很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效利用的理念。例如,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以水作为核心构成了循环体系,形成了以江河、梯田、村寨、森林为一体的良性原始农业生态循环系统。良性循环也使得哈尼梯田这一独特的

灌溉系统和奇异而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延续至今。

此外,农业文化遗产体现的是一整套系统,既包括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与经验、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也包括农业生产民俗与制度、农作物品种以及传统农耕信仰等。这些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农业生产活动的积累与沉淀,经过岁月的发展流传下来,这种可持续性活态传承的最好体现。例如,入选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时也入选了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呈现的是距今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化石,以及树龄2700年的野生古茶树和古老的人工栽培千年万亩古茶园。这些野生古茶树以及古茶园在今天依然是当地重要的农业生产系统,是当地最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

云南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在性

农业文化遗产强调人类与其所处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并创造传承的过程。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开西地南夷,置县24,云南即为其一。云南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是农业文化遗产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例如,入选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就很好地体现了云南农业悠久的历史文。3500多年前,澜沧江流域就有核桃分布。康熙《云南通志》卷十记载“核桃大理漾濞者佳”。

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人类适应外



哈尼梯田里的稻谷迎来丰收 本报记者刘宇丹摄

部环境,尤其是适应独特的自然地理、地域环境后而进行的系统生产活动。云南的地形地貌独特,高原、山地、盆地、河谷、丘陵等相间分布,类型多样复杂。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形成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土壤。例如,云南腾冲梳榔江水牛养殖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种水牛主要生活在云南省腾冲市梳榔江上游的低热河谷地带,是我国发现的唯一的河流型水牛。

此外,云南的气候也有助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云南属于典型的低纬高原式的立体气候,气候带在垂直方向上变化大,“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这种气候还表现为低纬地区四季温差和年温差小、高原地区气温日变化大。“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温和,一雨成冬”。农业生产与气候紧密相关,既受制于气候,也能适应气候并形成特定的农业生产系统。例如,入选第六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文山三七种植系统,三七的生长对温度、水分、光照、海拔等都有苛刻的要求,云南文山独特的气候条件为三七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

活态传承 云南农业文化遗产的路径

盘活家底是进行活态传承的第一要务。盘活农业文化遗产家底可以从传统村落入手。传统村落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经济、社会价值。农业文化遗产大多与传统村落相依共存。

目前,在建建部公布的五批共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中,云南省拥有708个,位列全国第二。云南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但是云南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仍是“处在深闺人未知”的状态。因此,可以从传统村落入手,采取“顺藤摸瓜”的形式进行摸排,盘活云南农业文化遗产。

对挖掘出来的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分类整理。分类标准可以按照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区分为农业生产类和小农业技术类,即大农业文化遗产和小农业文化遗产。此外,也可以按照世界粮农组织所制定的七个标准进行分类,分别是以水稻为基础的农业系统、以玉米和块根作物为基础的农业系统、以芋头为基础的农业系统、游牧与半游牧系统、独特的灌溉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复杂的多层庭园系统以及狩猎—采集系统。掌握特色与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申报,才能提高云南农业文化遗产进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的比例,进而为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铺垫。

建立动态保护机制。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体现在延续至今、没有停息的农业生产耕作上。只有在持续的耕作中,这种农业生产系统的生命力才会愈发旺盛。如今,当工业文明不断蔓延到乡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系统、生产技术等愈发成熟,建立动态的保护机制对农业文化遗产来讲愈发显得紧迫和重要。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云南文山三七 本报记者张文峰摄

诗文云南

侬家畎亩烟波里 太华山下打鱼回

——古诗歌里的滇池渔家生活

耿嘉文/图

昆明是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南诏从洱海地区向东拓展,进入滇池地区,东巡的南诏王阁罗凤看到这里“山河可以作屏障,川陆可以养人民”,就于唐广德二年(764年)命长子凤伽异在滇池北岸,建立起“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的拓东城,形成了东临盘龙江,西、南俱为滇池环绕的“水城”格局。到了明代,这种格局因为在云南府城周边实行大量屯垦,让府城以南成为富庶的农业区而改变,但是,因为城内外大小河道互通互连、水网纵横交错,又让昆明呈现出江南“水乡”的风貌。

昆明既是“五百里滇池”边上的“水城”,又是水网纵横如“水乡”,水产自然丰富多样,以鱼为说,就有鲤鱼、白鱼、金钱鱼、细鳞鱼、鲃鱼、鲫鱼、黑鱼、鲢鱼、红鱼、花鱼、鱼鳊头、马鱼、海鲈、鲮鱼等,可捞可食的还有虾蟹、螺蛳、甲鱼、海菜等等。数千年来,当地居民就用各式各样的鱼网撑船捕鱼。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滇池从事捕捞渔业的大小船舶有300多艘。早在连通滇池主体的草海上,渔船穿梭来往,捕捞的鱼装在水盆里,出草海沿大观河运到篆塘,或者运到城南盘龙江昆明最大的夜市云津桥售卖。在今天盘龙江西边、临近金马碧鸡坊,有一条连通书林街、东寺街的古老街道,就叫鱼课司街,以这里曾经设有管理昆明渔业税务的专门机构鱼课司而得名。明代吴浦的《捕鱼图歌》,可以帮我们了解鱼课与渔民的关系:

官雨而后春水浑,夹河两岸皆渔村。捕鱼但愿鱼足,风波虽险宁复论。大鱼无多趁时卖,小鱼连船贱如芥。大鱼卖钱须纳官,小鱼得钱还酒债。渔郎捕鱼莫厌贫,官河鱼来朝朝新。劝郎莫厌渔业贱,古来亦有非常人。

古老昆明的捕捞渔业,自有人类活动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近年对滇池周边滨水而居的原始聚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食用过遗弃后堆积如山的螺蛳壳,说明捕捞鱼虾螺蛳,早已是古老的滇池居民维系生存的重要方式。进入文明时代后,滇池的渔业捕捞一直延续。阁罗凤所看中的滇池地区“川陆可以养人民”,就包括

这里有丰富的水产。不过,直到元代以后的昆明诗文中,才出现滇池渔父渔夫的身影。

滇水不可涉,石栈参嵯峨。胡能宅蛟龙,但可藏鼉鼉。我欲澄其源,应自昆台何。寸璋凉靡散,临流将奈何。高山紫芝曲,渔父沧浪歌。斯人久不作,千载无清波。

这首元代云南顺庆路判官乔坚所写的《滇池》,其立意不在记述滇池渔事,所以虽然提到“渔父沧浪歌”,但重点还是在感叹滇池深广“可藏鼉鼉”,随时“风荡惊涛”,难以清静。元明之际,来自江南山阴的毛铨所写《渔村钓月》,才集中写到滇池打鱼的事,只是他所吟咏的,其实是隐士的渔夫之乐:

暖暖山吐月,沄沄水增波。水落月在天,天影相荡摩。借问持竿人,夜凉鱼反多。零露洒青蓑,轻风吹绿蓑。归来夜将半,饮酒且复歌。即此以为乐,生年能几何。

明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英曾孙冰璘,于景泰八年秋末写下9首《滇池竹枝词》,其中一首赞美渔家女:

船中渔娃韵韵多,画桨荡船长短歌。蒿杆过膝霞一片,鬓发盘头云满窝。一首叙说渔家夫妇在打鱼之余,采

割蒲草、编织蒲草席出售:

郎采蒲来依织蒲,织成大席哪忍铺。

青楼置作舞茵衬,识得侬家辛苦无?

还有一首写到了把出没过风波里打来的鱼虾,拿去鱼课司交纳赋税:

一竿一网作犁锄,朝去暮来常在湖。

侬家畎亩烟波里,只把鱼虾充税租。

清康熙年间举人时亮工所写的两首《昆明竹枝词》,把滇池渔家的生活写得富有诗意:

芦浦几处芦成堆,遙见扁舟柳外来。

日暮泊船何太晚,太华山下打鱼回。

葵叶红时鱼更肥,日斜收网晒蓑衣。

孙儿拍手忙携去,三市街头换酒归。

这两首竹枝词,既说到了每天早出晚归,到太华山下的滇池深处打鱼,又说了将捕捞的鱼拿到城南南贾云集的三市街售卖交易。其中充满了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气氛。

正如农耕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在滇池捕鱼,每天也如宋代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所写那样充满风险:“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所以,滇池渔家里,就有人每天都为出海打鱼的家人担心。清张九铨的《昆明竹枝词》,就以比较的手法写道:

大姑朗居大海东,小姑朗居草海东。

草海深深系舟稳,大海风波杀杀依。



滇池草海用扳置捕鱼的老人

诗中说的大海、草海,就是以海埂为界的南北两部分。以南的部分是滇池的主体,水域宽广,风浪变化大,每天都往那样的地方打鱼,当然就让“依”担忧到极点,要到看见出海的人平安进了家门,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以北的部分靠近城池,面积微小且浅,在此捕鱼自然平稳无险。

想要全面了解滇池渔家的酸甜苦辣,就来读读袁嘉谷的八首《昆明湖欸歌》:秋烟漠漠雨霏霏,黄叶西飞一棹归。家在湖中无定处,碧鸡山上碧鸡飞。

昆明湖水久浮家,一叶扁舟逐浪花。只恐西方风又起,吹来暴雨打鱼叉。

雨丝如织月如弓,杨柳阴深隐钓篷。牵到大观堤畔系,肯随风浪泛西东。

湖中小雨水涵天,湖上人家洗暮烟。帆背风轻渔火静,二分秋色碧芦边。

草海朝朝碧一湾,篆塘夜夜钓舟还。何时不怕蛟龙恶,安稳强如睡佛山。

绮云浓处彩船撑,歌舞游人竞出城。小小渔娃多解事,低头打桨唱无声。

晒网人归浦月亭,懊怀一曲问谁听。捕来金钱鱼多少,好换街头竹叶青。

阴云阴雨涨红波,晓起扳罾十字河。莫效老鸬贪不足,放舟且去扣舷歌。



静观昆明篆塘的渔舟

昆明滇池后海渔船

昆明书林街口的鱼课司街路牌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娜娜



林则徐(1785年—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七峰退叟、瓶泉居士、柘社散人等,福建侯官县人,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林则徐是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任翰林编修、江苏按察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陕甘总督、陕西巡抚等职,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云贵总督,在任期间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治理边疆,民族团结。林则徐上任云贵总督之初,恰逢因当局者长期以来各有偏袒所导致的汉回构衅,他宣扬“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原则,率兵平定迤西。《清史稿》卷369《林则徐传》记载:“二十七年,授云贵总督。云南汉、回互斗焚杀,历数十年。会保山回民控於京,汉民夺犯,毁官署,拆澜沧江桥以拒,镇道不能制。则徐主止分良莠,不分汉、回。二十八年,亲督师往剿,途中闻弥渡客回滋乱,移兵破其巢,歼匪数百。保山民闻风股栗,缚犯迎师,诛其首要,散其胁从,召汉、回父老谕以恩信,遂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戕官诸重犯,威德震洽,边境乃安。加太子太保,赐花翎。”林则徐的做法不仅平定了边疆战事,更让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居的云南得以实现民族团结。

整顿矿务,提倡商办。清朝前期,中国一直处于对外贸易逆差之中,白银大量外流,《清宣宗实录》卷309记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十八年),渐漏至三千万两。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日甚一日,年复一年,诚不知伊于胡底?”云南矿产资源丰富,是清政府白银开采的重要基地之一。林则徐上任云贵总督之后,对云南的冶矿业作了详细的调查,进而鼓励民众开发银矿:“小民趋利若鹜,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亦不驱自去,断无盘踞废矿,甘心亏本之理”(《林则徐诗文选注·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与此同时,林则徐还实行矿业整顿,提出改革银矿的经营方式、调整统治政策等办法来解决云南矿业萧条的问题。在林则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刺激下,云南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商民聚资伙办银矿小高潮,截至1848年云南已有9个商办民办的银矿,使云南久已衰竭的银矿生产重新振兴起来。

诗文应和,以文会友。早在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之前,其所著的《滇韶纪程》就已记录了他与云南的缘分。《滇韶纪程》为林则徐赴任云南正考官途中的日记。逐日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闰四月二十七日奉旨后,自五月八日离京起程,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五省,于八月初日抵昆明之事。考订沿途古迹、地理沿革,品题山水名胜。担任云贵总督后,林则徐与昆明本地的人文也多有交往,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与华亭寺方丈释庆有(号岩栖)的友情,林则徐曾为其题诗四首,皆为七言绝句。以“最是寒斋清梵梦,枕边诗味得来佳”一句为例,足以见林则徐与诗友岩栖一见如故。

晚清学者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对林则徐一生所做之事作出了评价:“公盛德纯忠,丰功伟绩,他人得无一已足名世,而公所树立,倏指未能尽。其尤著者,新疆屯田、江南漕漕、云南回务三事,皆以一时贻百世之利,一心布万民之泽。”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林则徐:“他的经历清白无瑕。他有着一个从未犯过错误的人的强烈信心。他为人处世很讲道德,有强烈的责任感。”由此可见,林则徐除了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外,他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五月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对云南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不可磨灭,应该为云南各族儿女所铭记。

(作者系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联办